哀黃裳先生

張昌華

往事鈎沉

閭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

黃裳，這棵文壇常青樹，九十歲後仍筆耕不輟，新作迭出。然世事無常，他的新書《紙上蹁躚》剛上架，《唁汝昌》的墨跡未乾，自己也變成一片黃葉化作塵泥了。噩耗傳來，友人打電話來，說黃裳先生走了，南京的文化人都很欽羨他、熱絡他，我們應該「表示」一下。

我想，南京人愛黃裳，除崇敬先生本人外，或多或少緣自他與南京的淵源、對南京的感情，以及他爲南京留下的經典文字《金陵五記》吧。

我與黃裳相識於新千年。十一年的過從，黃裳致我函札三十五通。先生歷來惜字如金，信札雖短，但言簡意賅。今撫箋思人，先生的音容笑貌、率性眞情盈溢於字裡行間。

黃裳的文名飲譽當代文壇。「腹有詩書氣自華」，他博學廣識，在文學領域涉獵也多，以散文稱著。他的文字古樸典雅可稱雄時下，那珠璣文字可以下酒。然先生自斂、謙遜，我深有感觸。新千年，我選編一本現當代名人寫南京的散文集《南京情調》，向先生乞序。先生自謙「愧不敢當」，終經不住我的盛情與執著而命筆，光增了該書的篇幅。之後，《人物》雜誌約我寫黃裳，我函請先生接受我的採訪。先生客氣地說：「不勝榮幸並惶恐。平生碌碌，無可言說，行徑都在過去所出諸集中……我不善言辭，接談甚難令先生滿意。但亟願晤面，如承過訪，當掃徑以待也。」一派平藹，溫馨可人。誠如先生所言，他不善言辭，採訪基本是一問一答；但先生思維敏捷，每答中肯到位。初稿寫出我請他寓目。先生閱後覆我，說我對他「感情吹噓，不安之至，感與愧並。」「有關史實諸事，少加刪潤即於稿前加墨，務希諒之。」我檢視改稿，先生除刪去一處稍稍「過譽」之詞，還糾正兩處舛誤。《黃裳：書香人和》發表後爲《讀書文摘》等多家報刊轉載，大家都很高興。

黃裳對魯迅尊崇之至。二〇〇八年我編《魯迅的藝術世界》，請他賜序，先生一口承允，但不貿然下筆，在讀了全書大樣才寫。序中說：「回憶個人數十年來受到（魯迅）先生的種種薰習、垂教……產生絕大的影響。」黃裳愛收藏，珍惜前賢紙墨如命。世人鮮知的是，他慨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魯迅手跡捐贈給國家。

二〇一〇年我已退休多年，仍有幸爲先生編四卷本《黃裳散文》，始得緣通讀了黃裳的六大卷三百萬餘言《黃裳文集》。梳理分類費時三月，選目數易其稿，多至可以裝訂成冊。但這次合作不大「圓滿」，先生旨意是選本要「出新」，力選一些以往選本中未及的篇目；而出版社追求的是有「賣點」，要可讀性的名篇。應該說各自成理，都沒有錯，或只缺點「換位思考」吧。惟我夾在中間，有點難受。我必須溝通雙方、兼顧兩頭，選目一變再變，書名一改再改。用先生後來的話說：最後總是「老闆說了算」。先生顯然有所不快，最終還是接受了，並對我的辛勞表示感謝，表現了前輩對後學的寬容。

黃裳先生雖不善辭令，但有個性，剛柔並濟。有時性情率眞，有話直說。我曾將兩本小書呈他審正，他讀後指出《走近錢鍾書》文中對錢手寫書信釋文的一處誤讀；一眼指出《陳寅恪：惟大英雄能本色》中，陳氏自壽詩中「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一句，後自改爲「笑亂頭」，我沿的是舊說。先生慧眼「疑非事實」，一針見血挑明「那是不明詩法之妄人」所爲。並確鑿指出始作俑者及出處，令我輩孤陋寡聞者肅然起敬。

黃裳平時不苟言笑，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言辭中時有幽默。因他筆下的南京堪稱一絕，似乎成了一種符號。有出版單位或個人出相關南京的書，常託我請黃先生賜序。久而久之，先生不幹了，幽默我說：「余為南京新書作序，甚感榮幸。近來我幾成有關南京的新書的專業寫序戶。」二〇〇〇年歲末，他來南京故地重遊，我有幸陪他訪雞鳴寺、探胭脂井、登掃葉樓、尋老虎橋舊址等，均屬跑馬看花，匆匆一瞥。晚餐席間，我請他在我的冊頁題墨，他在自述故地重遊行色匆匆時，結句是「自笑如老伶工登場點到而已。」令人捧腹。

黃裳喜收藏名人墨跡，我在讀他的《珠還記幸》後，竭力倣法。他的書法，我很欣賞。某年見他爲友人倪培翔花箋上的題詩，眼饞得很，斗膽張口索字。先生於大暑中揮汗命筆，爲我寫了首他五十年前舊作《無題》，掛號寄來。這幅字收在我剛剛出版的《名家翰墨》一書中。九月五日中午我將此書付郵，孰料晚間先生作古，天人永隔。

書比人長壽。黃裳的《金陵五記》是金陵的文化瑰寶之一，猶如南京明城牆上一塊磚石，與金陵同在。

美國人在中國

馮進

如是我見

根據官方數據，目前有七萬美國人住在中國內地。他們有些只呆幾年，但也有些在此生活了十年以上。美國的公共廣播電台 NPR 最近推出一檔題爲「美國人在中國」的節目，採訪在中國生活的美國人，和聽衆分享他們的經歷。這些美國人是怎麼描述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的呢？

首先，初到貴地，他們覺得中國人特別喜歡讓他們上電視。製片人讓他們穿上古色古香的唐裝、漢服，操着稀奇古怪的口音說上幾句半通不通的漢語，既借此推銷商品，又增加喜慶色彩。「中國觀衆看我們，就像我們看嬰兒或者寵物狗表演一樣，覺得他們特別可愛」，老美如是評論中國人的心態。

不過，在中國住的日子久了，他們對中國文化以及自己和中國人的關係也加深了理解。譬如，艾文・奧斯諾斯（Evan Osnos）一九九六年到達中國，現爲《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撰寫中國觀察方面的文字。他說，如今美國和歐洲人大多把中國視爲經濟強國，可是大部分中國人的自我形象是：中國是一個人口很多、問題也很多的弱國；即使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三分之一的人還沒有自己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大約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國人認爲中國是經濟強國。

華裔美籍的搖滾音樂家郭怡廣（Kaiser Kuo）在北京住了十幾年，先後組織了「唐朝」和「春秋」兩個搖滾樂團，現爲網絡搜索引擎百度工作。他住北京的胡同，有個中國女朋友，也結交了很多中國朋友，原以爲自己已完全融入中國社會了。可是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國飛機轟炸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以後，中國社會群情激憤，卻讓他猛然領悟到自己和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想法不同。他覺得那是個事故，中國人卻認爲是美國霸權主義的陰謀。他因此感到自己身處兩個世界、兩種文化之間的悲哀。

相比之下，《老北京最後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的作者邁克爾・梅耶（Michael Meyer）回憶起他在東北生活的經歷時，卻興致勃勃。梅耶在中國生活十七年了，他的第一本書描寫他在北京生活三年的經歷和奧運會之前北京城的巨變。現在他在東北創作第二本書《在滿洲里》，他的中國太太卻在香港當律師。每次當地人「像美國人看到一隻長頸鹿在街頭走過」時一樣，帶着「友好的好奇心」接近他，聽說他們夫妻兩地分居，總要發出「哎呀」、「我的媽呀」之類的感嘆，評論說他們這樣怎麼能生孩子呢。

他聲稱自己對中國人的問題已倒背如流，可以按照這個順序回答：我是美國人；我住中國很久了；我屬鼠；我身高一米八六；我沒有工資，因爲我是作家；我覺得中文不難，比英文容易學；我會用筷子。不過，有時他也會碰到特別的情形。一次有個建築工人誇獎他的美髯，另有一個商人問他，智慧是否比道德更重要。美國經濟蕭條後，當地人同情他，覺得他留在中國是因爲母國不景氣。更有人宣告，尼克松是最好的總統，他之後美國政治就每況愈下了。

但梅耶也指出，美國人關於中國的問題更爲離奇。比如「中國這麼遠，你怎麼能住那裡？」還有，「中國人和我們很不一樣。他們想變成我們這樣的經濟超級大國，對嗎？」梅耶說，中國人和美國人的自尊心一樣強，兩者也有類似的幽默感，而有網絡和電腦視頻的所在就不能算遠。他甚至說，比較中美兩國人問他的問題，他簡直無法判斷哪個才是「發展中國家」。

關於俄國女詩人詩選

馬海甸

燈下集

以女詩人結集的詩選，大凡文化大國都出過，而以俄羅斯居多。我見過最早的一冊，是一九〇一年版的《詩人與女詩人詩選》，四百餘頁，私人刊行。一九八九年，莫斯科同時代人出版社出版的《繆斯的女皇——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俄國女詩人詩選》，收集了十月革命前重要女詩人的作品。蘇聯解體後，各色各樣的女詩人合集紛紛出版，其中埃克斯莫出版社分別於二〇〇六、二〇〇九和二〇一〇年分別出版了《俄國女詩人詩選》、《「我這樣愛你」——女性愛情詩》以及《俄國女詩人選》。前者厚達千頁，是同類書中最大型的。至於冠以白銀時代女詩人之名的合集就更多了。白銀時代女詩人十之七八爲非官方詩人，在斯大林時代備受排擠，作品不能刊登，詩集不能出版，一生偃蹇，她們今天獲得讀者的青睞，應該不是毫無原因的。

提到俄國女詩人，必不可少的兩位人物當然是本欄多次提及的阿赫瑪托娃和茨維塔耶娃。這兩位是大詩人，即便置之世界文壇也毫不遜色的巨擘，俄國詩壇百年不遇的天才。自阿赫瑪托娃於一九六六年去世後，能與之比肩的女詩人迄無來者。學術界認爲，活躍於十九世紀初葉的安娜・布寧娜是俄國最早的女詩人，而較爲成熟的女詩人則爲一生幾乎縱貫整個十九世紀的卡洛琳娜・帕甫洛娃。但在今人讀來，她們的作品熱情有餘而深刻不足，甚至不無稚拙，儘管俄羅斯權威的《詩人文庫》叢書，單獨立卷的女詩人始自帕甫洛娃。俄國女詩人從帕甫洛娃到茨維塔耶娃，即從成長到成熟，只用了一百年時間，到二十世紀中葉，她們的成就，已足可與英美女詩人較一日之短長。

早就有意想譯一部俄國女詩人詩集，而且已動筆，之所以遲遲未成書，原因有幾個。其一，目前仍在資料搜集階段，儘管到手的合集、專集已粗具規模，但有幾位重要詩人的專集或未出，或已出而遍尋無着。其二，閱讀和選詩是一個不小的工程。選詩雖說往往受制於選家的偏嗜，但有定評的代表作還是當選就選，不能忽略，各種詩學論著和評論，乃至回憶錄和日記，都要盡可能搜集和閱讀。其三，翻譯當然是最花時間和精力之一環。以一人之力譯合集，原文百彩千姿、姹紫嫣紅的詩風，很可能會被譯得千人一面、千腔一調。每思及此，便踟躕不已，難以下筆。

言歸正傳。除上文提及兩位大詩人，俄國詩歌史上還有不少優秀詩人。如吉皮烏斯、米拉・洛赫維茨卡婭、庫茲明娜—卡拉瓦耶娃（西方通稱瑪麗婭嬤嬤）、帕爾諾克、彼得羅維赫、別爾戈利茨以及阿赫馬杜林娜，這些詩人的中譯，除吉皮烏斯有專集外，或只有散譯，或壓根兒不曾譯成中文。譬如阿赫瑪托娃對伯林盛讚不已的彼得羅維赫，她的詩就沒譯成中文，連散譯也沒有。而米拉・洛赫維茨卡婭在自己祖國遭到的冷遇更令人難以理解，多年前《詩人世界》叢書出過一版小開本的詩集，沒有註釋，沒有題解，眼下就連這部寒傖的集子，也成了可遇不可求的舊籍了。在我看來，洛赫維茨卡婭和彼得羅維赫都有單獨出譯詩集的價值。前者是俄羅斯現代派的先驅，又有俄國薩福之稱，可惜未屆不惑之年即溘然長逝；後者一生游離於政治之外，以吟詠大自然之作見長，生前默默無聞，安於寂寞。把她們發掘出來，讓更多的讀者認識其人，是中譯者的責任。有兩位女詩人在蘇聯時代獲得較高評價，可望躋身優秀詩人之列，也曾有中譯傳世，但蘇聯解體後詩集連重印的機會也渺不可得，她們是阿利格爾和英貝爾。對這兩位詩人，蘇聯時代的評價固不足恃，像現在這樣的恝然置之，也不盡公允。從這個意義上說，不但中國須重選詩歌合集，俄羅斯的詩歌合集何嘗不須重選？

其實，俄羅斯小詩人也頗有可讀之作。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舉兩個。亞美尼亞籍的蘇聯小說家莎吉尼揚，早年以詩集《東方集》闖出了名堂，這是一部富有東方色彩的小冊子，我僅讀過零篇即爲之心折。可惜作家以後棄詩從文，專攻小說，致力於刻畫人性化的列寧，在這方面反而成績平平。《東方集》初版後即不曾再版，僅零篇收在莎吉尼揚九卷集中，爲幾十頁的詩集，去買下洋洋近七千頁的多卷本文集，眞有點「買櫝還珠」的意味，即使心有不甘，也只好譯出手邊各選本的五、六首詩敷衍過去。名作家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前妻克蘭季耶夫斯卡婭—托爾斯泰婭，是我所喜歡的小詩人，她的詩集《道路》和回憶錄都是薄薄的不超過三百頁小書。詩寫得凝練、簡潔，大多數爲四行體，押交韻，變化略嫌不足，難能可貴的是集子裡有一組十四行詩（寫於一九五四年，共十四首），這也可以說是在歷經嚴寒後蘇聯詩壇解凍的先聲吧。

除俄文本外，我還收有烏蘭汗主編的《蘇聯女詩人抒情詩選》（灕江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及俄國學者瓦倫金娜・波盧欣娜主編的英譯《俄羅斯女詩人》。前者雖已成明日黃花，但仍不失爲中譯俄國女詩人詩選的嚆矢。波盧欣娜是布羅茨基專家，近年著有兩卷本《同時代人眼中的約瑟夫・布羅茨基》和《布羅茨基：我們時代的詩人》，她從專攻一家到爲當代俄國女詩人（凡七十餘人）編集，可說敏於思而勤於學。英國學者卡特里奧納・凱利編著的牛津版《俄國女性創作史，一八二〇——一九九二》及《俄國女性創作選，一七七七——一九九二》，都是皇皇六、七百頁的巨帙，雖然創作史和創作選有別於詩歌史和詩歌合集，但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希臘小島（攝影）　Liu Lok

穿破不穿錯

鄧小秋

文化什錦

近些年來，戲曲發展迅猛，新戲層出不窮。很多新編劇目，在表演、音樂、造型、布景等方面，都有許多成功的創造與突破。尤其是服裝設計，已經不再局限於過去的「五蟒五靠」的束縛。各種人物的服裝設計，五花八門，花團錦簇。或依古制，或求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些新穎的服裝，無論合適與否，作爲藝術上的一種追求，還是值得鼓勵與讚許的。

當然，傳統的戲曲服裝，歷經多少年來前輩藝人的革新創造，基本已經定型。包括服裝的色彩，以及水袖、翎子、絨球、掛飾等附件，都不容有所差錯。而現在有一些年輕演員，因爲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在演出傳統老戲時，往往也有一種求新的追求。有時候，對過去的一些常識有所忽視。只求穿得光鮮漂亮，卻不合人物的身份，陰差陽錯，從側引起很多老觀衆的不滿與非議。其實，過去戲班由於物質條件的局限性，都只能配置大致相同的「大衣箱」與「二衣箱」。因此，對於服裝的穿着，約定俗成，循規蹈矩，已形成一定的規則。譬如，老藝人經常所說的「寧穿破，不穿錯」。長期以來，這已經成爲前輩戲曲藝人所一直遵循的法則。

因爲，演員所扮演的人物，有他特定的身份與性格。而在戲班裡，基本上都是「五蟒五靠」。所以，穿什麼衣服，戴什麼帽子，都有着一定的規定，不能胡戴亂穿。

戲曲服裝有各種色彩，除了好看以外，也可以從色彩上來區別各種人物的身份與個性。在傳統老戲中，我們可以看到，凡是穿黃色的蟒、袍、披、靠的，大多都是帝王身份。像《打龍袍》中的宋仁宗、《賀后罵殿》中的宋太宗等。穿紅色袍服的，則多是王侯、大臣。像《大紅袍》中的海瑞、《打嚴嵩》中的嚴嵩等。而穿藍衣的，則官階就要低一些。像《法門寺》中的趙廉、《玉堂春》中的劉秉義等。前輩武生大師蓋叫天生前曾經就此向青年演員談到過這方面的常識，他以《八大錘》一劇爲例，談到劇中的金兀朮是穿黃靠的，因爲他是遼國的太子。岳飛穿白靠，因爲他是三軍主帥。高寵雖然是王爺身份，但在宋軍中是以岳飛爲主，所以不能穿黃靠，要穿綠靠。綠色的服裝，在戲曲中是象徵一個人的性格梗直、勇猛。高寵性烈似火，天生神力，綠靠正合他的個性。其他像性格剛勇的紅臉漢子，如關羽、吳漢、關勝、姜維等，一般也都是穿的綠靠。劇中的牛皋穿的是黑靠，表示他生性魯莽。王貴穿的是紅靠，則表示他性格急躁。湯和的性格比較平和，就穿的藍靠。「紅、黃、藍、白、黑」五種色彩的「行頭」，在傳統戲中都有講究，不能任意穿着。

蒸菜有味

李笙清

飲食男女

關於蒸菜，我吃過很多地方的風味，唯有家鄉洪湖的蒸菜，那種馥郁的荆楚風味，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最愛。

家鄉有句俗話：「無蒸菜不成席面。」逢年過節，或者家裡來客人，蒸菜都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傳統菜餚。蒸菜還是一道「敬老菜」，給老人做壽時，老人坐上首，蒸菜要擺放在老人面前，老人不動筷子，一桌人都不能動它。吃年夜飯時，首先要用蒸菜供奉灶神呢！臘月二十四，還要用蒸菜供奉灶神呢！

家鄉做蒸菜分素蒸和葷蒸，素蒸的用料主要是蔬菜和來自大湖堰塘的水菜，如蘿蔔、白菜、土豆、南瓜、菱角、蓮子、蓮藕、茼蒿、豆腐圓子等，葷蒸的用料則是雞鴨魚肉等，也有葷素搭配來做蒸菜的，如乾豆角蒸臘肉。蒸菜裝盤後，還要澆上用濕澱粉、醋、味精和雞湯勾芡的湯汁，使蒸菜色澤晶瑩，味道鮮美。

在家鄉，蒸菜有「三蒸」之說。「素三蒸」爲蓮子、蓮藕和菱角等湖中水菜，「葷三蒸」最有名的原料也離不開一個「湖」字，主要有「黃鮎、鰱魚、鯉魚」等食材，還有鸕鷀、野雞、野鴨等湖中野味，也有傳統的「蒸魚、蒸肉、蒸圓子」，特別是蒸臘肉，拌入五香、八角、桂皮一起蒸熟，吃起來臘香撲鼻，味道鮮美，餘味悠長。其實「三蒸」只是一個叫順了的名詞而已，一般人家辦宴席時，做幾樣蒸菜可以根據情況來靈活掌握，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家鄉，葷蒸的品種更多，泥鰍、河蚌、螺螄、草魚、甲魚、財魚、黃鱔、雞鴨、排骨、粉蒸肉等，五花八門，皆可入蒸，尤其是糯米肉丸，每到春節家人團聚時端上飯桌，圓潤飽滿，晶瑩剔透，既美觀，又洋溢着團團圓圓的吉祥喜氣。

除了粉蒸，家鄉還有清蒸的做法，如清蒸鯽魚。一般選用八兩至一斤的新鮮鯽魚，去鱗剖開，洗淨後，用刀在魚身上斜劃幾道口子，抹上鹽、料酒、生抽、油和香葱、薑末，擺放在盤子裡。然後放上蒸籠，鍋裡加水，用中火煮至蒸籠上大汽，再關火密閉虛蒸一會兒，就可以取出，倒掉盤子裡含有腥味的水汁，淋上一些醋。在鍋裡倒上少許油，加入葱、蒜泥、雞精、薑絲，煸炒幾下，起鍋淋在魚身上，一道鮮美可口的清蒸鯽魚就做好了，它保持了菜餚的原汁原味，色香俱全。家鄉做蒸菜還講究就地取材，比方說四處可見的荷葉，碧綠田田，用它來蒸菜，不僅有一種荷葉的天然清香，而且還是暑天的清火降溫的好食品呢。

在家鄉林林總總的蒸菜中，我最愛吃的是粉蒸蓮藕。這道菜做起來非常簡單，原料一般選用荷塘裡的新鮮深水老藕，用筷子將藕的表面刮洗乾淨，去掉藕節，然後用刀拍破，切成塊狀裝入盆內，加鹽、味精、薑末等一起攪拌均勻，醃漬片刻。然後切二兩五花肉丁拌入，再將醃漬好的藕用粗米粉拌勻，放入籠屜內，用旺火蒸熟後取出，盛入盤內，淋上香油，澆上現做的熱芡汁，撒上葱花就行了。粉蒸蓮藕粉質細嫩，黏糊而不沾齒，滑膩爽口極了。

率眞

嚴方正

文化經緯

孔子是不是應該被稱爲聖人，人們有不同看法，但孔子具有率眞的寶貴品格，卻是人們的共識。孔子始終堅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他承認自己不如弟子顏回，在農事方面則不如老農和老圃；他恥惡內心對某人包藏着怨恨，表面上卻和那人交朋友；他反對以德報怨，主張以直報怨；他在喪親的人家吃飯，從來就沒有吃飽過……

被人們稱爲當代最後一位大儒的梁漱溟，也是一個率眞的人。他認爲，孔學不應當看成是一門學問，而應當看成是一種生活。他自己只要一息尚存，便要踐行他所理想的生活。

梁漱溟和毛澤東是同齡人，自抗戰時期起，兩人便成爲對話的朋友。一九五三年，兩人因政見不合分道揚鑣，此後梁漱溟吃過不少苦頭，包括「文革」中被抄家、挨批鬥等。毛澤東故去後，梁漱溟對他有如此回憶：「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啓超（任公）比梁漱溟年長二十歲，兩人有過多方面的交往。一九四三年，梁啓超逝世十四周年的時候，梁漱溟寫了《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文中有如此評價：「任公為人富有熱情，亦就不免於多欲。有時天眞爛漫，不失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着，一生遂多失敗。」寫了這些，意猶未盡，梁漱溟又在後記裡補充：「情感浮動如任公者，亦是學問上不能深入之人。其一生所為學問除文學方面（此方面特重情感）外，都無大價值，不過於初學者有啓迪之用。」這樣來寫紀念文字的，實屬罕見，梁漱溟道出他爲文的原因：「我受先生知遇，終身銘感，右方言論質直，正是不敢有負先生垂愛之厚意。」

梁漱溟給兒子培寬和培恕留下許多眞切的記念。梁瀨溟曾對學生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梁培寬說，所以當山東孔子研究所的人給他寄來登記表，聘請他爲研究所的專家時，他拒絕了，他說：「我不是專家，誰認為我是就讓誰填去。」

讓梁培寬記憶猶新的是，父親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梁漱溟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即完成了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這時起便顯露出入世濟人的情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身體力行地從事鄉村建設、促進國共合作、到政協建言、主張把批林和批孔分開來，都是爲了蒼生。